

邓小平年谱

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邓小平

邓小平年谱

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主编 冷溶 汪作玲

副主编 阎建琪 熊华源

中央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邓小平年谱：1975—1997/冷溶、汪作玲主编。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7
ISBN 7-5073-1676-9

I. 邓… II. ①冷…②汪… III. 邓小平 (1904—
1997) 一年谱—1975—1997 IV. A7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67954 号

邓小平年谱 (1975—1997)

编 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主 编/冷 溶 汪作玲
副 主 编/阎建琪 熊华源
责任编辑/边彦军 张晓彤
封面设计/张 戈
版式设计/寇 炫

出版发行/中央文献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四北大街前毛家湾 1 号
邮 编/100017
销售热线/63097018
经 销/新华书店
排 版/北京地质印刷厂
印 刷/三河新世纪印刷厂

· 680×960mm 16 开 87.25 印张 1020 千字
2004 年 7 月第 1 版 2004 年 9 月第 3 次印刷
印 数 30001—40000 册

ISBN 7-5073-1676-9/K·700 定价：110.00 元 (上、下)

(本书附赠图书数据库光盘一张)

参加本卷编写的有：

徐永军 高 屹 许保利

刘金田 姜淑萍 阎建琪

裴淑英 宋毅军 李红喜

张 曙

目 录

1981年	(703)
1982年	(795)
1983年	(879)
1984年	(953)
1985年	(1023)
1986年	(1101)
1987年	(1163)
1988年	(1222)
1989年	(1262)
1990年	(1306)
1991年	(1325)
1992年	(1334)
1993年	(1358)
1994年	(1368)
1995年	(1371)
1996年	(1373)
1997年	(1374)
后 记	(1382)

1981年 七十七岁

1月4日 上午，会见美国参议院共和党副领袖西奥多·史蒂文斯和美国共和党全国少数民族委员会主席、美国总统出口委员会副主席陈香梅，阐明中国政府对发展中美关系的原则立场。指出：一九七九年中美建交，主要是解决了台湾问题，美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解决了这个问题，才取得了中美新关系的建立，并使之继续得到发展。以后能否继续发展中美关系、中日关系以及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关系，这个问题是焦点。现在美国报刊和一些人的言论中的有些观点如果不加澄清，很可能导致中美关系的后退。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很弱很穷，装备又落后，所以中国是无足轻重的，是一个不值得重视的国家。这个问题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一个对世界力量对比的判断问题。我们历来不回避穷和弱，可是我们有“块头大”这个好处，还有就是不信邪，需要中国自己做的事情，中国是敢于面对现实的。对中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发生错误判断的人，起码不会有一个正确的国际战略。第二种观点，说中国现在有求于美国，美国无求于中国。中国是很穷，但有一个长处，就是中国本身的生存能力比较强，即使现在世界发生大的动乱和各种难测的变化，中国自己也能够活下去。以为中国有求于人的判断，会产生错误的决策。第三种观点，认为如果美国政府对苏联采取强硬政策，像台湾这样的问题，中国可以吞下去。吞不下去，不会吞下去的。如果真的出现这样的情况，由于台湾问题迫使

中美关系倒退的话，中国不会吞下去。中国肯定要做出相应的反应。一旦发生某种事情迫使中美关系倒退的话，我们也只能正视现实。第四种观点，认为中国政府信奉的意识形态旨在摧毁类似美国这样的政府。这样的观点至少不是八十年代的观点，也不是七十年代的观点，而是恢复了六十年代以前的观点。我们真诚地希望中美关系不但不要停滞，而且要发展。我们重视的是美国新政府上任后采取的行动。我刚才说的都是中国政府的正式立场。把这个问题讲清楚是有益的。我们高兴地听到史蒂文斯先生刚才讲的话，那就是里根先生在台湾问题上会谨慎从事。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题为《发展中美关系的原则立场》。

1月6日 阅胡愈之〔1〕、楚图南〔2〕、孙起孟〔3〕建议由民主党派办一份报纸的来信和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关于改进政协工作的几点意见和建议》，批示印发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各同志。

1月10日 阅聂华桐〔4〕等十四位美籍华人科学家关于中国决定建造高能加速器问题的来信，作出批示：“这个问题值得重视，我过去是积极分子，看来需要重新考虑，请方毅同志召集一个专家会议进行论证。”来信对中国决定建造高能加速器持保留意见，希望中国领导人在科技政策的轻重取舍上有所调整，

〔1〕 胡愈之，当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

〔2〕 楚图南，当时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

〔3〕 孙起孟，当时任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副主任委员。

〔4〕 聂华桐，当时任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理论物理研究所教授。

并建议国内科技界对建造高能加速器问题进行深入的论证。

△ 审阅耿飏《关于以军委名义下发紧缩军费开支厉行节约指示问题的请示》报告，作出批示：“军委常委各同志核阅。”

1月11日 审阅外交部《里根政府加强与台关系和我对策的请示》报告，批示印发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各同志：“此事应在政治局会议上郑重讨论一次。”“最近最迫切的事，是台湾官方人士将参加里根就职典礼，外交部应就此提出交涉，并拟出对案。”此后，外交部在北京和柴泽民〔1〕在华盛顿就台湾官方人士出席里根就职典礼问题向美国政府提出严正交涉，明确表示，如果台湾官方人士出席里根就职典礼，就是制造“两个中国”，中国大使绝不出席典礼。后美国作出让步，以因病“住进了医院”为由，没有让已经抵达华盛顿的台湾官方人士出席里根就职典礼。

1月12日 上午，会见德永正利〔2〕率领的日本参议院代表团。在介绍中国国内情况时指出：“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精神上的问题很多，所以搞现代化要增加精神文明的内容。现在，大公无私、舍己为公、艰苦奋斗等道德观念都遭到了破坏。要恢复是一代人的问题。现在的社会风气不如过去，动不动就打砸抢，年轻的娃娃甚至动刀子，不讲礼貌了，也不照顾别人的利益、集体的利益、国家的利益。但不是说所有一代人都如此，不过在相当一部分年轻娃娃中有这个问题。没有好的道德观念和

〔1〕 柴泽民，当时任中国驻美国大使。

〔2〕 德永正利，当时任日本参议院议长。

社会风气,即使现代化建设起来了也不好,富起来了也不好。在谈到中国人事问题时指出:我们有个根本的改革,就是逐步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这是搞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内容,有利于有才能的人上来。这是很费脑筋的问题,有很多障碍,但不这样做就没有希望。在谈到经济调整时说:经济调整越看越重要,是必须做的。调整表面上看是后退,实质上是前进。前两年我们头脑发热,想搞快反而不能快,现在冷静下来了,这就是进步。

△ 上午,会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总理李钟玉。指出:中朝友好关系是经历过烽火考验的,是一种特殊的关系。我们两国在国际事务和其他问题上是一贯相互支持的。中朝友好关系一定会继续加强和发展。晚,同李钟玉单独会谈,向他通报并请转告金日成:我们中央政治局已经同意华国锋辞去党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请求,至于华国锋辞职后,党的主席人选,可以告诉金主席,我是不会当的,因为年纪大了。

1月16日 上午,会见日本众议院副议长冈田春夫和夫人一行。在谈到中国经济调整问题时指出:前一个时期,我们缺乏经验,有点急,一些见效慢的项目搞得太多太大,超过了自己的能力。我们总结经验,决定进行调整,不调整不行。去年底我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的中心议题就是经济调整。但是,调整并没有改变原来确定的政策,比如对外开放政策、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政策、调动农民积极性的政策,这些政策都是正确的,还要坚持。调整国民经济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如果不调整当前的国民经济,财政继续出现赤字,物价势必上涨。调整

国民经济，缩小基本建设的规模，是一时的后退，实际上是前进。经过调整，我们就可以在经济发展上迈出更加稳定的、扎实的前进步伐。从这个意义上说，调整经济有利于四个现代化的建设。在谈到建国后三十年的历史时指出：国际、国内都把这三十一年的成绩估计低了。总的来说，三十一年中，我们做了很多的事情，成绩不少，虽然也犯了一些错误，但不是一片漆黑。总结历史要把这个体现出来。

△ 下午，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中美关系问题。

1月17日 听取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负责人汇报某部炮兵团一九八〇年十一月发生的严重政治事件〔1〕的情况。指出：炮兵团问题的性质是严重的，是敌我界限的问题，不是思想认识问题，不是一般的错误问题，是思想、立场附和郜怀明的反动思想、立场的问题，是要另立党、另立政府、另立军队这样一个问题。炮兵团问题是北京军区的一个严重的动态，也是全军部队的一个严重动态，一定要引起严重注意，不能小看。北京军区要组织专门调查，解剖麻雀，弄清发生这些问题的原因，作出具体分析、具体判断，有针对性地对部队进行教育，解决部队的思想问题。并在北京军区党委关于炮兵团事件处理情况的报告上批示：印发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和中央军委各同志，“这是发生在军队里的一件至为严重的、明目张胆的反革

〔1〕 1980年11月，河北省鸡泽县武装部军械库临时工郜怀明，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炮兵团进行反革命宣传活动。炮兵团负责人两次召开团营干部会议，为他的反动宣传提供条件。1981年，郜怀明被北京军区法院以策动叛乱罪判刑，事件中的其他责任人也分别受到刑事处罚或党纪、政纪处分。

命政治事件，也是一个非常值得好好解剖的一个麻雀”。

1月19日 上午，会见巴基斯坦军事代表团。在介绍中国经济调整情况时说：调整不意味着改变政策。我们的各项政策，包括对外政策，要继续贯彻。调整的是步伐。在谈到国际形势时说：提高警惕是必要的，但不要过分严重估计形势，不要造成人为的紧张，天天生活在恐惧状态中不行，这对我们不利。

1月中旬 听取陈慕华〔1〕关于全国计划生育工作的汇报，对一九八〇年所取得的成绩表示满意。指出：计划生育工作是一项战略性任务，一定要抓好，要大造舆论，表扬好的典型。随后，陈慕华向参加十日至十四日召开的全国计划生育宣传工作座谈会的全体同志传达了这一指示。

1月23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讨论对外政策时指出：对外政策中有三个方面的问题，即如何判断国际形势、如何看待三个世界的划分、如何对待美国和苏联。这三个问题，需要好好议一议。会议还讨论了宋庆龄入党和担任国家名誉主席的问题。

1月24日 同意赵紫阳、万里、姚依林、宋任穷等商议后提出的国家机关部分部委主要负责干部调整方案。

〔1〕 陈慕华，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组长、对外经济联络部部长。1981年3月还任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

1月25日 将《信访摘报》刊登的《一位团政委来信反映部队少数领导干部的思想情况》，批示印发中央军委常委和正在参加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同志。

1月26日 下午，会见澳大利亚外交部部长安东尼·奥斯汀·斯特里特。针对一段时期以来国外对中国领导人职务变动、审判“四人帮”等问题的种种议论，指出：世界上有好多议论都是一种不了解中国实际情况的猜测。半年前，我们的总理更迭了，我和几位副总理年龄比较大不当副总理了。今后还可能有个别的变动。这是好事情，表明中国这种人事变动在向健康方向发展。这些变动更有利于中国的安定团结，更有利于我们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更有利于实现我们国家的民主集中制，过去一些个人专断的现象可以得到更好的纠正，因此也更有利于加强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更符合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世界上有人议论，说我们搞“非毛化”。我们没有搞“非毛化”，我们坚持毛泽东思想。毛主席在晚年确实有很大的错误，也要讲清楚。讲清楚的好处是可以教育我们的人民和后代，也教育我们自己。但毛主席的历史功绩不能抹煞。毛泽东思想是历史形成的，是在四十年代我们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肯定的，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思想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这个财富我们不能丢。既然我们坚持毛泽东思想，怎么能说是“非毛化”？我们要写个文件〔1〕，主要是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肯定要坚持毛泽东思想，肯定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错误是第二位。要把过去的问题讲清楚。要有一个统一的认识。通过这次审判“四人帮”和

〔1〕指正在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这个文件的公布，把过去的问题了结了，不再纠缠。我们十亿人民一心一意向前看，向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努力。在谈到南北问题〔1〕和南北对话〔2〕时指出：南方和北方的概念主要不是按地理来划分的，主要是按经济情况来划分的。中国应该算南方。南北对话的目的是，北方要在经济上帮助南方。提出这个问题是重要的。发达国家要真正花点力量，花点钱来帮助贫穷国家的发展。这是解决世界矛盾的方法。

2月3日 上午，会见即将离任的美国驻华大使伦纳德·伍德科克。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发现经济上搞得太急，提出调整，但当时对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认识不够，采取的措施不得力，特别是对基本建设的调整不果断，去年才下了更大的决心。现在采取的调整措施，一是压缩基本建设项目，二是减少其他行政性开支。压缩基本建设项目，可能会影响今后三四年的发展速度，但能使我们前进的步伐和基础更加扎实。还指出：中国农村的生产生活情况，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好过，主要是政策见效。所谓政策见效，就是充分尊重公社、大队、生产队的自主权，提高了他们的积极性，发挥了他们的优势和特长。在回答中共党内是否会进行整风时指出：整党整风迟早要进行，但可以缓一步，先通过教育，让那些犯错误的人在实践中有改正错误的机会和表现。

2月5日 上午，出席全国政协春节茶话会。

〔1〕 南北问题，指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经济关系不平等问题。因发展中国家多数在发达国家的南方，故名。

〔2〕 南北对话，指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为解决双方经济关系问题进行的对话和会谈。又称南北会谈。

△ 阅美籍华人吴健雄、袁家骝教授建议中国在国民经济调整期间不应停止发展高能物理研究和电子加速器建造的来信，作出批示：“此事请财经小组审定，宜早作抉择。”

△ 阅郭维城〔1〕希望中央派一位领导同志在他调职前同他谈一次话的来信，作出批示：“请任穷同志约他一谈。”七日，又将郭维城建议由中央挑选一位年轻知识分子干部担任铁道部部长的来信，批送胡耀邦、宋任穷等处理。

2月6日 将胡乔木关于中央全会〔2〕议程等问题的来信，批送胡耀邦、李先念、陈云、赵紫阳阅，并批示：“此事可在近日常委会上一议，请耀邦、紫阳准备，依林、万里参加。”

2月11日 下午，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对外政策问题。在谈到外交战略方针时指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建立国际反霸统一战线。我们的口号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这个格局不要变。对苏联贸易可以维持一定数额，边界问题也可以有些接触，但涉及恢复两国关系的谈判就要慎重。没有出现新的大的情况（比如苏联从阿富汗撤军），两国关系的谈判就不能恢复。这是一个大的姿态，否则就会损害我们的外交格局。在国际关系中，现在比较形象的语言是打牌。打牌是个手段，用打牌来达到什么目的，我始终怀疑。我们要从政治角度考虑外交问题，不用打牌的方式。在谈到对第三世界的政策

〔1〕 郭维城，当时任铁道部部长，1981年4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副司令员。

〔2〕 指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

时指出：三个世界的划分，是毛主席晚年提出来的，是重要的贡献，我们实际上是根据毛主席这个思想做的。对第三世界的工作，今后要加强。由于我们自己还很困难，对第三世界的援助数额不可能增加，但各种层次的友好访问和民间来往要增加。

2月12日 上午，会见日本政府代表、日本前外务大臣大来佐武郎。在介绍中国经济调整情况时说：在调整中，我们从日本和其他国家引进成套设备的建设项目有一部分要停建或缓建。这种调整是必要的，是为更好地前进打下牢固的基础。当然，这会使某些外国厂商经济上受到一些损失。我们希望能共同寻找一种更好的办法，如利用政府贷款或合资经营等方式，使停建的项目继续搞下去，这对双方都有好处。如果一时找不出好的办法，我们也愿意承担合理的经济责任。我们历来是不管怎样困难，也要守信用。

△ 下午，会见弗朗索瓦·密特朗^{〔1〕}率领的法国社会党政治代表团。在谈话中分析了爆发战争的根源，并就延缓战争爆发、维护世界和平的途径发表意见。指出：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能够打世界大战的只有两家，美国和苏联。任何一种力量要称霸世界，必须取得欧洲，因为欧洲才具有真正强大的经济力量、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维护世界和平，延缓战争的爆发，单单依靠哪一家不行，必须大家联合起来。我们多年来一直希望欧洲联合和强大。

〔1〕 弗朗索瓦·密特朗，当时任法国社会党第一书记。

△ 下午，会见随密特朗来访的法国记者。指出：密特朗一九六一年访问过中国，时隔二十年又来中国访问，对增进中国共产党和法国社会党之间的了解和友谊是有益处的。在回答中国共产党是否打算同法国共产党进行接触时指出：就我们来说，所有法国的政治力量我们都愿意接触。在回答有关西哈努克亲王最近提出的愿意同柬埔寨其他爱国力量联合的建议时说：这是一个新的姿态，带有积极的意义，我们表示欢迎。在回答关于对毛泽东的评价问题时指出：我们始终要坚持毛泽东思想。毛泽东主席在晚年确有错误，但是，就他一生来说，他对中国人民、中国革命的贡献是非常伟大的。他的功劳是第一位的，而他的错误，尽管我们要讲清楚，但毕竟是第二位的。在回答如何看待西方对江青被判刑的反应时指出：各种反应都有，有人认为判轻了，有人认为判重了。但这是中国自己的事情，中国人民认为这样判是恰当的。

2月13日 上午，在住地同李先念、胡耀邦、赵紫阳谈话。

2月14日 为英国培格曼出版公司编辑出版的《邓小平副主席文集》英文版〔1〕作序。《序言》指出：从五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末，世界历史在错综复杂的矛盾和激烈的动荡中发展，社会主义中国和中国共产党也走过了自己的很不寻常的道路。这本文集里的第一篇讲话，即一九五六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发表的时候，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正以其蓬勃的生机和造成中国社会深刻变

〔1〕 这本文集收录了邓小平1956年到1979年的部分讲话，1984年12月由培格曼出版公司出版。

化的巨大成就，为世界人士所瞩目。六十年代中期以后的“文化大革命”，使我国人民遭到了一场巨大的浩劫。我们的国家经历了一场严峻的考验。从一九七六年十月，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一九七八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重新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这本文集里的大部分讲话都属于这一时期。我想，这本小小的文集可能为各国对中国的情况、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以及我们几十年来的历史感兴趣的人，从某些侧面提供一些材料。这就是我同意出版这本文集的原因。《序言》又指出：毛泽东主席说过这样的话：“国际主义者的共产党员，是否可以同时又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呢？我们认为不但是可以的，而且是应该的。”我荣幸地以中华民族一员的资格，而成为世界的公民。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我们的民族曾经创造过灿烂的古代文明，也经历过各种深重的苦难和进行过付出巨大代价的、坚忍不拔的斗争。现在，我们正在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在安定团结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建设高度发展的物质文明和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中国人民将通过自己的创造性劳动根本改变自己国家的落后面貌，以崭新的面貌，自立于世界的先进行列，并且同各国人民一道，共同推进人类进步的正义事业。我深深地相信，中国的未来是属于中国人民的，世界的未来是属于世界人民的。《序言》还指出：近年以来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发展，使得我产生了这样的想法：如果今天再就本文集中的同样的题目讲话，我也许会讲得更加完备一些。但是，已经客观地存在着的历史，除了不断地加深对于它的认识、理解之外，是谁也改变不了的。因此，我同意照讲话当时的样子全文编入文集，不做任何改动。如果有一天这些讲话失去重新阅读的价值，那就证明社会已经飞快地前进了。那有什么不好呢？